

江南

文化研究

—第4辑—

浙江省社
浙江师

Studies of Jian

重点研究基地
文化研究中心

Culture

2014

10月

10月

江南

文化研究

江南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专辑

—第4辑—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Studies of Jiangnan Culture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 /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
研究中心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77-3583-3

I. ①江… II. ①浙… III. ①文化史—研究—华东
地区 ②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①K295②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0250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装帧设计: 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0×123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0001—1000册

版 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编 委 会

顾 问 章培恒 章开沅

主 编 梅新林 王嘉良

执行主编 陈国灿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家范 方卫平 孙 逊 吴福辉 陈玉兰

陈华文 陈国灿 胡晓明 俞樟华 高 玉

黄灵庚 龚国庆 潘富恩

目 录

江南文化域境下的阳明学之传播

——以浙闽区域为例	钱 明(1)
陈亮的历史进化论与其伦理问题初探	王 斌 巩长青(11)
阮元的学术思想及汉宋学术史观	范立舟(14)
明代朱熹年谱知见录	尹 波(21)
清代江南社区文化集群与文人的精神家园	
——以常州白云渡为例	杨旭辉(27)
试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夏汉宁(38)
文徵明的儒者形象	杨 昇(49)
游走在“乐群”与“乐道”之间	
——唐中叶湖州文人集团交游酬唱诗论略	丁国强(56)
弹词《三国志玉玺传》初探	龚 敏(62)
越剧和婺剧文化空间地域演进比较研究	陈 雄(69)
江南诗性文化与长三角当代城市文化的建构	王洪岳(77)
清前期江南市民文化建设论析	王日根 倪丽萍(83)
南宋明州楼钥家族与佛教	李 辉(88)
隋唐时期越州高僧及其佛学影响	姚培锋(94)
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先驱	
——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	允春喜(102)
明清之际江南的三教交涉及其效应	陈永革(109)
陈郡谢氏在两晋南朝源流世系及婚宦考索	马晓坤(114)
江南政治文化的变革与中国政治的转型	陈 丽 吕建云(120)
浙江地域文化三精神	聂付生(126)
近代外来文明的地方性回应	
——以上海城乡为中心	戴鞍钢(134)
略论南宋浙江地区进士	龚剑锋 王正良(138)

明清时期地方士绅在江南地区的禁奢活动	陈彩云(146)
明清以来上海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	
——以上海与浙北区域经济关系为例	陈剑峰(157)
唐代浙南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	张剑光(164)
18 世纪以降江南居民休闲娱乐生活中的消费	黄敬斌(174)
从宋元方志看南宋江南地区桥梁建设	张锦鹏(186)
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考	顾宏义(193)
战争环境下民众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	
——抗战时期浙江省个案研究	张根福 岳钦韬(199)
杭嘉湖水乡环境与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关系初探	黄爱梅(211)
区域人文环境与商办浙江铁路	王 道(217)
论孔氏南宗的宗族规制	刘小成(224)
近 30 年来徽州祠堂研究述略	邵建东(229)
后 记	(234)

江南文化域境下的阳明学之传播

——以浙闽区域为例

钱 明*

摘 要:阳明学创设于浙东地区,传播于浙中、浙西地区,而受阻于浙北、浙南地区。但阳明学对浙南地区产生过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阳明本人未在浙南讲过学,他的好友与弟子黄绾却在浙南活动多年,他的崇信者项乔、王激、王叔果等人曾接引过许多浙南弟子,他的好友张璁在浙南的影响力亦不可小视。浙南阳明学的特点,一是浙南阳明学者或者与阳明门人同朝为官,或者与阳明门人同时同地讲学,这些人大都是通过与阳明弟子亲密交往的经历,接受或部分接受了阳明学说,参与或部分参与了王门的讲学活动,并把王门的学术旨趣带回了家乡;二是浙南阳明学者在接受阳明学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湛甘泉门人的影响,具有王湛合一的倾向;三是浙南阳明学者大都具有实学文化的背景资源,所以在汲取阳明学的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把心学与实学相整合,或者用实学来解构心学,使心学实学化;四是浙南阳明学者身上还有文学化的倾向。如果说浙东阳明学者具有勤立宗旨的学术性格,浙西阳明学者具有谈说艺文的学术性格,那么浙南阳明学者所体现出来的便是浙东学者与浙西文人的双重品格。

关键词:阳明学;浙南;福建;思想传播

王阳明歿后不久,其思想学说即已在部分地区成了事实上的主流。然而,阳明学说即使在它的发源地——浙江的传播路径也是极不平衡的,与地域文化相遇后所产生的区域效应更是存有趣。概而言之,阳明学创设于浙东地区,传播于浙中、浙西地区,而受阻于浙北部分地区。那么,阳明学对于有着丰富地域文化资源的浙南地区又意味着什么呢?王阳明本人虽未在浙南讲过学,但他的好友与弟子黄绾却在浙南活动多年,他的崇信者项乔、王激、王叔果等人曾接引过许多浙南弟子,他的好友张璁在浙南的影响力亦是不可小视。故此可以说,阳明学对浙南地区产生过影响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种影响力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实现的?又是以何种方式与浙南原有文化传统发生碰撞的?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对扩展浙学研究的丰富内涵与多元取向,不仅有理论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经济文化单位与行政地理概念不同,它是自古沿袭或俗成的文化地理概念。如果说文化区域是经过长期自然磨合、具有较强稳定性的地理单位,那么行政区域便是带有较多人为性、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改变的地理单位。民国时期的省,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化而来,其规模虽比元代的行省要小,但基本上承袭了行省的架构。元代行省的设置,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其区域划分,不仅不考虑同单元之内的经济文化联系,甚至还要故意割裂它,或把一些根本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人为地合并在一起。比如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和一个直辖市,而江苏南北,视同水火;安徽则被江、淮分成三部分,差距颇大;浙江的两边,亦被捏在一块,并把近于闽文化圈的瓯越地区与宁绍地区同视为“浙东”。类似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个省份。反倒是历史上的“郡”,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

* 钱明,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单位,故而其内部沟通相对来说也方便许多。

秦汉时,浙南(温、台、处三府)和福建同属闽中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单位。因此,作为温州之别称的“瓯越”与浙南文化的“瓯越”,其含义是不能混同的,后者的范围要明显大于前者。从文化区域的角度看,瓯越文化的区域概念是模糊的,不像行政区划那样可以被精确划出其边界。一般来说,瓯越文化区向东可包括雁荡山以北的黄岩、温岭等地,往北可包括瓯江中下游的青田等地。横贯浙南的瓯江、飞云江和敖江即通常所谓的三江流域,又称瓯越或浙南文化区,它的核心区域是永嘉、青田等地,黄岩则地处该地之边际。出生永嘉的叶适和出生瑞安的陈傅良、出生青田的刘基、出生黄岩的黄筮和出生永嘉的项乔,可视为瓯越文化区在宋明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卓越代表。如果说以南宋叶适、陈傅良为代表的突出功利的文化形态是瓯越才子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以明初刘基为代表的突出诚信的文化形态是英雄文化与才子文化的结合^[1],那么以明中叶黄筮、项乔为代表的突出心性的文化形态便是心学文化与实学文化的有机整合。

浙南思想文化的巅峰期出现在南宋。出生平阳的晚清著名思想家宋恕说过:“及南都临安,温为王畿,士多入太学,游公卿间,解额几半今之全浙,又出薛、郑、陈、叶诸大师,提倡实学,于是温之人文遂甲禹域。”元代以前,浙南的人文传统主要由理学文化和实学文化所组成,其繁荣程度,可谓两浙之冠。可到了元明时期,浙南人文陷入颓势:“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温复荒僻,至皇朝(清朝)荒益甚。”^[2]于是温籍学者就有了复兴浙南文化的愿望与诉求,而这种诉求又是与明代中叶兴起于浙东地区的王学及清代末年兴起于江浙地区的经学有紧密联系的。

晚清温籍学者孙希旦曾对温州儒学的发展作过如下总结:

盖吾乡儒术之兴,虽肇于东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为永嘉之学,以鼎立于新安、东阳间,虽百世后不能强为轩轾者,必推之乾、熙诸儒。至叶文修、陈潜室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馨实其绪余,以迄于明之黄文简准、张吉士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火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嘉先生之风微矣。^[3]

在孙希旦看来,由薛季宣、叶适、陈傅良等“乾、熙诸儒”开创的“能卓然自成”的永嘉之学,自叶味道、陈埴师事朱熹并在温州地区传播朱子学后,经元入明,以迄黄淮、张文选,使朱子学成为浙南区域文化的主流,到了明中后期的项乔、王叔果等人,因受阳明学势力的侵染,永嘉之学终趋式微。这种把朱子学、阳明学与温州地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其实并不符合浙南儒学发展的实际。

浙南的理学文化,可谓源于其悠久的程学传统。在面对朱子学时,这种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便充分显现了出来。据陈荣捷先生统计,以知名者而言,朱子门人有四五百之众,其中有籍贯可考者中,浙籍 11 州共有弟子 80 余人,而以温、台之浙南地区为最多(39 位),金、衢、处之浙中地区次之(35 位),宁、绍之浙东地区再次之(15 位),严州之浙北地区又次之(7 位),杭、嘉、湖之浙西地区则最少,仅有 5 人^[4]。浙江朱学之盛,与朱熹的福建闽县门人黄榦的努力密不可分。黄百家说: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5]

黄榦尝任职台州、永嘉,朱熹去世后,他继续接引浙南弟子,为浙南培养了诸多朱子学者,从而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浙南地区的主导地位。

浙南的实学文化,则源于由程学转化而来的经世事功传统,永嘉学派是其突出代表。黄百家还说:

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起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

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6〕

所以朱熹在教育温州弟子时,特别重视克治他们受永嘉地区文化沾染的不良风气〔7〕。然而,明代温州学者王叔杲却不无自豪地说:

东瓯环山带海,灵秀磅礴,毓为人文,高贤大良,后先彪炳。而性理之学,倡自赵宋诸儒哲,盖渊源濂洛,羽翼关闽。〔8〕

浙南的实学文化,便是“羽翼关闽”的重要坐标,其突出表现就是重义而不轻利,义利并重,藏否人物以事功为标准。是故元人所撰的《温州路重建庙学记》曾批评瓯越学风“未免以逐末忘本,事外忘内坏之”〔9〕。明代温州硕儒项乔则出于完整阐释义利关系的立场而矫正道:

予谓温俗以利视官久矣,况上以利求之,下以利应之,孰甘折阅而知向义者?予复何言哉!……义者,利之和也。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人知以利为利,不知以义为利,未有能义利其身者也。〔10〕

而这种以功利为评价标准的做法,在浙南阳明学者中亦的确不乏其人。如王叔杲对伍文定协助王阳明平叛的举措便评价甚高,认为“王守仁之功非伍无以成其始,孙许之节,非伍无以成其终。三臣之后,既加优叙,文定之裔,岂可不录?”对伍文定功绩得不到公平对待深表不满。在重视事功的前提下,王叔杲等人还积极参与了戚继光等人的抗倭斗争。王叔杲尝疏荐两广总督谭纶总兵南塘,戚继光遂议募练南兵数万以备倭寇,“凡廩饩岁给不费,皆公(叔杲)从中调复而边务以修”〔11〕。与越中阳明学大家一般热衷于讲学传道不同,浙南阳明学大家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抗倭斗争,与抗倭名将及相关军政人员关系密切。王世贞曾撰有《阳谷王公祖生祠记》、《送大参永嘉阳谷王公改任叙》等文,对王叔杲的抗倭事迹予以高度评价,这与越中阳明学者以道德文章、为学宗旨显于世的门户特征有较大不同。浙南阳明学者自始至终对王门中的空虚之风予以尖锐批评,就与这种文化土壤有莫大关系。故此宋恕所说的:“宋室南渡,瓯学始盛。陈、叶诸子,心期王佐,纯于永康,实于新安。……闽党横行,百家畔降,而瓯学亦绝矣。”〔12〕其中以重视外王、强调义利合一的永嘉学比朱子学“实”,比陈亮的永康学“纯”,是正确的;但认为瓯学绝于闽党,则说得不完全对。因为即使经过朱子学改造后的浙南人文传统中,仍保留了大量实学文化的基因,以至浙南学者在面对盛于大江南北的阳明学时,仍能保持自己的学术个性,使阳明学在与浙南地域文化相遇后便出现了向经世事功学回归的某些变异。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阳明学进入浙南后所碰到的特殊困难,一方面是由于浙南有悠久的理学文化和实学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浙南地区有独特的科举之盛名。所谓“东嘉学校士,自昔文风,为两浙最”〔13〕,便是对两宋时期温州科举之盛况的客观描述。南宋以后,朱子学在逐渐上升为主流思想的同时,其语录、集注还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科场完全被朱子“议论”所统治,而阳明学却始终游离于朝政与乡政之间,未进入科举层面。故此,科举文化繁盛、科举人才众多的浙南地区,自然会从功利的立场出发,亲近朱子学而疏远阳明学。

当然,除了文化土壤,影响浙南地域文化形成发展的因素还有那里的地理环境。“钱塘以南,名峦隩藪无虑百数,而永嘉为最著。”〔14〕创生于越中的阳明学在向浙南的传播过程中,即受制于崇山峻岭的重重阻隔,而全然不同于水陆驿站皆通、传道路径主要通过水路进行的浙江其他地区。从这一意义上说,浙南与浙东两地的学术交流要大大困难于拥有陆海两个通道的浙南与闽地之间的学术交流。而随着学术中心的转移,两宋时期受益于特殊历史原因而得以繁荣的浙南学术,到了明代,虽有状元宫谕周旋、榜眼尚

书王瓚、首辅张璁等政治人物登场,但学术明星则要明显少于两宋时期,这就使南宋开始的浙江学术中心的东移在明代中叶有了进一步加速的趋势。温岭学者洪启睿曾以温州瑞安为例,揭示了由宋到明的盛衰过程:“该瑞安故有学,大儒名卿由学而起者,彬彬相望,自宋称小邹鲁,迄我国初尤盛。嘉靖以来,人材科目日渐衰替而弗振。”王叔杲的学生周子恭也以书院教育为例,指出了宋元时期曾被称为“小邹鲁”的东瓯地区,到明代则出现了书院倾颓、科目不利的窘境^[15]。而这种学术中心的转移,无疑是与以南都为中心的明代经济文化圈的辐射作用以及明初以来温州地区海盗频仍、民不安生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

正是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下,经济文化中心向四周辐射的递减效应,在地处相对偏远的浙南山区,遂被明显放大了,从而使曾经繁荣的浙南文化出现了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因此可以说,创生于越中的阳明学说,在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过程中,在浙南地区遇到的阻碍和挫折,是要大大超过其他地区的。

王阳明本人讲学两浙,曾以浙东的宁绍地区为中心,然后扩展至浙中的金华、衢州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等地;惟有阳明足迹从未到过的地处瓯越文化中心的温州及其周边的台州、处州等地,不仅影响力相对微弱,而且真正称得上阳明学者的人也很少,这与浙江其他区域形成了鲜明对照。而阳明的门人后学在两浙的讲学状况,亦大致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作为王阳明路径之地的杭州、湖州、严州等地,到了明代后期,也成了其门人后学讲学的重要区域,同时台州、处州也被纳入到王门的讲学范围内。

然而,与同样属于王门讲学区域的江苏泰州、广东潮州等地不同,距离王学中心地带不远的浙南地区的王学势力,反而要大大弱于泰州和潮州。这是因为,泰州受到了王门南都讲学的辐射,潮州受到了阳明赣南讲学的影响,而浙南尤其是温州则由于地缘文化环境的影响和自然条件的阻隔,使阳明学的传播明显受挫。毫无疑问,受理学文化影响较深及其经世事功学传统,乃是浙南地区在阳明学传播过程中表现欠佳、应者寥寥的主因。换言之,阳明学在浙南地区影响较弱,除了阳明本人及其门人后学讲学不力外,地缘学术环境的制约可能是其中更主要的原因,一如阳明学在新安(今徽州)地区所遇到的曲折与挫折^[16]。

而对于王阳明来说,尽管“温,浙人之所鄙也”^[17],但事实上他还是有把己说传播到浙南地区的强烈愿望的,这从其多次赴浙南周边地区讲学的举措中即可窥知一斑。众所周知,在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奉命去江西、两广诸地,都会趁便在路径之地授徒讲学,《阳明年谱》中就有他在浙江桐庐、建德、龙游、常山、衢州等地讲学的记录。浙北、浙中地区学术水平的提升及王学信徒的涌现,即与阳明的沿途讲学密不可分。然而遗憾的是,阳明在这些地方的讲学活动,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辐射效应,从而吸引邻近的浙南(以温州为中心)、新安(以徽州为中心)人士前来听讲,这亦与泰州、潮州等地人士争先恐后地赶赴南中、赣南从学于阳明的情形大相径庭。

如同阳明学曾从浙西、皖南、赣北多个方向朝新安地区渗透一样,阳明学在从浙中、浙东向浙南渗透的同时,还有可能从闽东向浙南渗透。而阳明学说在闽中的传播过程也已被学者所证实^[18],只是阳明本人由于种种原因可以说并没有在闽地有意识、有目的地直接授徒讲学过,而最多只是利用“剿匪”的间隙,在闽西南的汀、漳地区讲过学。

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二年(1507年)夏,“先生至钱塘,(刘)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比登岸,奔山径数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纳。……与论出处,且将远遁。其人曰:‘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因为著,得《明夷》,遂决策返。……因取问道,由武夷而归。……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19]。这里需要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当时阳明的目的地并非福建,更不是去武夷山隐居讲学,而是附商船游舟山时,被飓风偶然漂到闽界的^[20]。阳明对闽中讲学的关心,是在中晚年以后的事,这从嘉靖五年(1526年)他为莆田人浙江大参朱应周写的《南冈说》中可窥见一斑。朱应周,名鸣阳,以南冈自号,家住“莆之壶公山下”,尝被莆人誉为“吾莆之风矣……而天下仰望其风采,则诚若风之鸣于朝阳者矣”。朱应周尝“以‘南冈’而自号”,并“勤

勤焉以薪于”其心师的阳明。而当阳明感觉到在浙奉职的朱应周有“乐闻规切砥砺”之愿望时,便适时地就自己并不熟知的“南冈”^[21]之地名或号来“与之论学”,所论之学则大都集中于阳明晚年的万物一体思想^[22]。通过向一位在莆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来宣讲自己的学说,其用意无非是希望朱应周归莆后,能积极宣传这一思想。因为阳明非常清楚,闽中是其学说传播的薄弱地区,而他则很想在朱子学的重要区域传播自己的学说,扩大自己的影响。这可能就是他欣然为朱应周撰文之真正目的。可见,阳明对王学传于闽地还是十分关心的,只是由于闽中特殊的思想文化环境,使得王学长期不为闽人所喜爱。蔡宗衮(字希渊,号我斋,山阴人)是阳明最早的弟子之一,尝“教授莆田,复不为当道所喜”^[23],即为最好的佐证。

第二,很显然,王阳明是从舟山由海路而并非从浙南陆路进入闽界的。当时浙省来往福建的商路主要是走陆路,这便是由苍南入福鼎的分水关路、由江山入浦城的枫岭关路和由常山转赣入崇安的分水关路,其中后两条路皆要出入武夷山。由于枫岭关路岭路高峻,不便行旅,明朝不设驿站,故而不是当时的主要通道,行旅一般以两条分水关路为主。阳明从武夷山返回钱塘时,估计走的是闽赣边界的分水关路,因这条道有水路可行,与钱塘江相贯通。

第三,既然阳明是“由武夷而归”,即只是路过武夷山,加之当时遭受追杀的险恶处境,所以在武夷山停留较长时间授徒讲学、显人耳目的可能性极小。甚至可以说,阳明从海路进入福建后传播阳明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阳明学最早传入闽地的最大可能,是阳明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这八府一州在明代皆属南赣巡抚管辖,南赣巡抚治所则在赣州)期间,通过军中讲学的方式,把自己的学说和门风传播到了闽西南的汀、漳地区。比如当时阳明就曾“识得”汀州府知府唐淳,并给予唐以较高评价^[24]。对于汀、漳地区阳明学的兴起,我们还可以从当地地方志中记载的有关当时不少士大夫由朱子改宗阳明的事例中窥知一斑。

由此可见,浙南地区虽比邻闽地,闽中王学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外延性影响,然而闽中王门毕竟属于王门中最薄弱的一支,与强大的闽中朱学相比,其在闽中的影响力几乎可忽略不计,更遑论对它的周边区域产生辐射。故此可以说,阳明学从闽东进入浙南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这就使浙南尤其是紧靠大海的温州地区仿佛成了阳明学传播的一个“死角”。

二

然而,通过对近年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的初步梳理,笔者却自我否定了所谓“死角”的说法,觉得还是改用“王学边缘地带”来概括和形容明代浙南学术发展之实况更为贴切。因为若从经济文化的地域视角出发而把温州周边地区也纳入浙南文化之考察范围的话,黄绾^[25]、范引年^[26]等人无疑可视为该地区的阳明入门弟子。除此之外,该地区还有不少阳明学的崇拜者和信奉者,尤其是作为瓯越文化核心区域的温州府,也存在个别与阳明学有很深瓜葛的学者名流,如王激、项乔、王叔果、王叔皋等人。尽管浙南阳明学并未形成王门地域流派,但上述人物的思想学说对浙南区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却不可低估。下面就以永嘉王氏和项乔为例阐释之。

永嘉王氏为明代文学世家,族人著述录于《温州经籍志》者有30余种。王氏自宋代由黄岩迁徙永嘉后,四传王毓,能诗文;三传王钺,生王激、王澈。王激(1479~1537),字子扬,号鹤山。正德二年参加省试,以《春秋》考取第二名,在县庠讲学,项乔是他的学生。嘉靖二年以《诗经》考取进士,授吉水知县,过三年升吏部文选司主事,七年主持广东乡试,九年任考功郎中,后历官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国子祭酒兼经筵讲官。王激“素有希圣之志,又得与阳明高第徐公曰仁(爱)、朱公守忠(节)、蔡公希颜(宗衮)、高公汝白(賁享,见注14)、应公邦升(大猷),及与王定斋(琥)、许杞山(璋)诸公素相友善切磨”^[27],备受王门诸子推崇。著有《文江集》^[28]、《鹤山文集》,事见罗洪先《明故中宪大夫国子监祭酒鹤山王公墓志铭》。王激(1473~1551),字子明,号东厓,正德八年举人,授礼部司务,累官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赠朝议大夫,生叔

果、叔果。王叔果(1617~1600)于嘉靖三十五年与兄叔果游南雍(南京国子监),与阳明高足程文德、欧阳德等相识,二人“器公伯仲,延与论学,意深许可”^[29],叔果、叔果遂心师阳明学。叔果还以事功、文学著称于世,李维桢尝赞叔果“学孔子之道,试于国,南北畿辅之政,迄今称之”^[30];王稚登则称叔果“虽以文采风流著称,乃其吏事又最善”^[31]。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王澈携二子如京师就学,时阳明弟子聂豹为吴郡守,素善王澈,见叔果奇之,聂讲《古本大学》及良知说,叔果辄会其旨。万历二十四年,徐阶督学试,叔果补郡诸生。叔果、叔果与阳明门人的关系极为密切,赵贞吉、许孚远、朱得之、诸南明、胡直、张元忬、宋仪望、焦竑、沈懋孝、耿定向等人皆与他俩有频繁的书信往来。但叔果最推崇耿定向,尝曰:“聆绪论,窃以私淑祛此鄙吝,受益良多矣。……恭维吾翁(指定向)斯文山斗,我道正宗,振铎以来,遂使绝学复明,士习丕变,中外倾注方殷……果每出翰教以示二三同志,未尝不叹服翁之言为至论。”^[32]同时对江右王门也相当赞赏,如称赞黄毅所说:“公少好良知之学,常读王文成、罗文恭遗书,多所自得,则其发之为诗,诚所谓谭性命而见真际者也。”^[33]又自称少与胡直“兄侄辈颇有志于斯道,顾志分多歧,竟成堕落,近稍知刊谢枝叶,归敛本真,而行且暮矣。然犹不敢遽然自弃,愿吾翁(指胡直)有以教之”;并酷评胡直“诚海内山斗”,“以未由侍教为憾”,而“此心则靡日不向往”;强调“惠教嘉编,读《世叙》,益知翁(指胡直)渊源有自,诚所谓以道德世其家者”^[34]。因此,王叔果不仅在永嘉王氏中,即使放到整个温州地区,也都称得上阳明学的忠实信奉者。

项乔(1493~1552),字迁之,永嘉人,号九曲山人,世称鸥东先生,曾先后师从高应祥、张璁、王澈、王澈。正德十四年举乡试,嘉靖八年春会试列第二。项乔性格“掘起孤立,不肯轻徇以为党援”^[35]。他的仕途生涯是在赣、皖、闽、粤诸省度过,与其交往的官员、学者亦以阳明门人居多,所以在《项乔集》中,与阳明门人的书信所占比例最高,对阳明门人的评论所用赞词甚多。比如他评论粤中王门的薛侃为“威武不屈,真铁汉也”;称赞“吾同年吉水罗子洪先、武进唐子顺之,以道德鸣于天下……二子皆不朽人物也”;自称“予别罗念庵凡十六年,别欧阳南野亦十六年,至己酉、辛亥方得会晤,裨益良多”;又称泰州王门的“东城林先生春者,质美而好学者也。故望其容,温温然;听其言,呐呐然;究其志,尤真真切切然。欲深造圣人之道,幼敬事心斋王先生”^[36]。他还常与阳明弟子谈学论道,尤其是嘉靖二十五年五六月间,他从家乡出发游历雁荡、天台、绍兴、杭州时,曾在黄岩拜访黄绾,“而久庵公议论裨益居多”;又赴绍兴访问王畿,言谈举止间流露出对阳明的极度崇拜和对王畿的高度认同。事后项乔在《游雁山天台西湖之云见纪事》中写道:

过二十里,为绍兴、山阴、会稽,是初五日也。时郡邑吏俱公出,乃移舟访同年龙溪王君畿。前沃洲(吕光洵)与予论汝中(王畿),或行不掩言,盖圣门狂者,考功氏以不谨去之,天下所共冤也。寒暄毕,(畿)与予论《大学》首章、《中庸》末章及“禹无间然”章,宿疑尽解。时汪清湖、吴同年州东彦亦携鹅酒来访,乃相与拜阳明王先生祠。先生虽未必圣人,而论道已至圣处,向喜读其书,今何幸得观遗像也。……初六,舟行过萧山过山……见九宫八卦田,皆宋时内地也。今坐阳明天真书院之下,若为先生衍龟畴者,而先生格言遗翰在书院者,予诵服之,不忍行也。^[37]

作为浙南地区阳明学的代表性人物,项乔不仅自己倾心阳明学,而且还影响到周围族群。如其亲家侯一麟(1517~?),字舜昭,号四谷山人,乐清人,为其长子项文焕的岳丈。侯一麟著有《“道对”》、《拟解》、《贫贱答》诸篇,无一不志之心者,益知四谷子之学,心学已”。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项乔及其他阳明学者的影响,曾强调说:

夫心,神物也。体太虚以为无,其无不无也;合万象以为有,其有不有也。无不无而号空守寂不假修为者,其失也妄;有不有而徇象遗真过于作为者,虽与空寂有间,卒亦不可与于道。^[38]

不过项乔的思想,除深受阳明学的影响之外,还明显带有永嘉学及闽学的痕迹。他把阳明学视为朱子学的补充,批评阳明学只知中人以上工夫而不知中人以下工夫,是故“使初学者闻之,终似少他一脚”:

阳明子议论或颠倒豪杰,使人自悟处有之,善学者不当执一看也。然深究阳明致良知之意,盖起于朱子“即凡天下之物而尽格之,而后物格,而后知至”之说,恐学者终无有得力之时,故不得已为此简易之说以救弊也。谓之救弊之说则可,就指为千圣秘密之藏,为万世不易之论则不可;指以语中人以上者则可,指以与要中人以下者则不可。良知本配良能而言,致知当对力行而言。既曰致良知,独不当又曰致良能乎?虽致字之中,亦有力行工夫在,而使初学者闻之,终似少他一脚,且似不涉见闻,使人无处着力,何能使之濯旧见以来新意也?圣人之言,上下皆通,前后左右不相背。^[39]

所以项乔对闽中学人评价颇高,如称王慎中为“海内通儒,我朝才子”^[40],并且对“八闽士类文藻”也予以了高度肯定,以为“可观者甚众,求其理学胸中了了,而笔力足以发之者,眼中似不多见也。……尤出于八闽风气之外者也”^[41]。

除了永嘉王氏及项乔等人的重要作用外,与王阳明及其门人关系相当密切的永嘉人张璁的地位亦不应忽视。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因与明世宗朱厚熜同音,世宗为其改名孚敬,赐字茂恭,正德十六年(1521年)始登进士,嘉靖六年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八年杨一清罢相,遂为首辅。在现存的张璁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张璁与王阳明交往的记载,但综合分析各类史料,则可以得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的结论,这主要表现在:1. 在黄绾的影响下^[42],嘉靖六年五月,阳明由张璁强力举荐,任两广总督及江西、湖广军务。然张璁的奏疏未见于《张璁集》、《谕对录》,只在清永嘉金璋的《漱芳斋厄言》中有点记载:

渔洋王文成诗(按:诗题《赣州谒王文成公祠》):“万古许孙同庙食,一时张桂太倾危。”按:……总督姚镛屡讨无功,张璁荐守仁代镛。观此,知文成平濠后闲度数年,独吾乡张文忠(璁)荐令起用,遂平思、田及断藤峡,再奏殊勋。是深知文成,前有王恭襄(王琼),后独张文忠耳,何云倾危也!惟桂萼素嫉之,因其擅离职守,拟旨革爵停谥。^[43]

可见在温州人眼里,张璁对阳明有着特殊的知遇之恩,足与王琼相匹配。2. 据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张璁闻阳明平定思、田的喜讯后,“即荐(阳明)于朝,取来作辅,共成天下之治。桂(萼)公、杨(一清)公闻之皆不乐”^[44]。说明在当时的内阁成员中,唯张璁对阳明最为赏识。3. 张璁称阳明为先生是在其晚年,当时阳明已过世多年。据张璁《咏万诗》跋:“阳明先生有《咏一》(按:为阳明逸诗)之作,书于画面,余得之珍重,复咏万以和之。罗峰。”^[45]说明阳明歿后不久,其诗作手迹就已成为包括张璁在内的众多文人士大夫珍爱的藏品。4. 张璁曾在正德十年前与阳明在南京会过面,并和之以诗,此即《寄王鸿胪正之》,诗云:

忆昨宿南湖,草堂真出郭。主人情话亲,晨钟浑不觉。紫袖满城中,风俗寝薄恶。……临予古法帖,瘦硬难遽学。持归到山中,尊之以高阁。……笔谏久不闻,士气散光岳。长吟起悲风,敢拟君独乐。^[46]

表现出对阳明之政见及其书法作品的高度关注。然此时张璁对阳明之说似乎并不关心,仅以一句“敢拟君独乐”来抒发自己的羡慕之心。直到阳明死后,他才对阳明学说产生了一定兴趣,而称其为先生,这无疑与席书、方献夫、黄绾、霍韬等阳明朝中弟子有密切关系。这些人不仅在政治上是张璁的坚定支持者,而且在思想上也对张璁以潜移默化的影响。5. 张璁对阳明的政治才能赞赏备至,他尝在《论边务》中说:

“然必谋略出群,如新建伯王守仁者乃足以当之也。”^[47]6. 阳明对张璁也相当尊重,尤其到晚年,致张璁的书信明显增多,而信的内容也大都是吹捧张璁的^[48]。7. 张璁曾提拔过不少阳明学者,如嘉靖八年张璁任总裁官,与詹事霍韬同主己丑科会试,唐顺之为是科会元,乡人项乔第二;三月,为廷试读卷官,取进士罗洪先等 323 名。据罗洪先《鸥东私录序》:“洪先与鸥东项君同登第,数相见于相国张公之门,间论学,默默然注视无酬语,已而授南部以去。”^[49]可见张璁与其所选拔的阳明学者在思想上是有许多共鸣之处的。

如果说永嘉王氏和项乔等人只是阳明学的倾心者,张璁只对阳明有知遇之恩和爱慕之情,那么私人王门的浙南学者也不可谓没有。比如应德成,字遐进,号越山,平阳金乡人,“生而端庄纯粹,神气肃清,弱冠刻励读书,呕血犹不释卷。既而麻城刘鲁桥先生司训昆(永嘉)庠,讲阳明良知之学,公与同里王敬所朝夕侍侧,论辨孜孜不倦,遂尽先生之学而学焉。《昆庠语录》出公撰述,大意以千圣真诀,不外‘道心’二字。良知即道心也,致良知正以扩此道心也。其立志坚,向道笃,涵养粹,德器完,卓然一时儒宗。隆庆丁卯、庚午连中浙闱。”^[50]再如蔡立身,字思曾,号凤池,平阳榆垌人,《青阳县志》、《九华山志》有其传。“弱冠,督学林大春公选雋士实胄,监试王守仁,复爵从祀子孙谢表,典则宏丽,一字一金,拔置首,谓‘浙士无双’。万历改元,试南畿,彻棘已报元卷,俄以浙江故,抑第六……凡七上春官不第,授青阳令。……修太白、阳明祠在九华山者,料材鳩工,于农隙为之,民不知劳,而士知向。方吉水邹南皋两为记。吉与青邻,南皋以直声闻天下,笑比河清,独时时携杖入九华山与公讲阳明之学,竟夕靡倦,盖重之也。”^[51]又如何白(1562~1642),乐清人,自称丹邱生,晚号鹤溪老渔,人称丹霞先生。一生未曾为官,其思想颇受李贽、公安派的影响,其诗友中有不少是公安派的人,所作《三子诗别邵不朋、郑仲仁、汪鼎父》云:“李老起温陵,别凿鸿濛窰。放言惊八垠,里耳皆如壤。鼎父早升堂,微音出一轶。”诗下自注:“鼎父为温陵李卓吾高弟也。”并评论袁宏道说:“公安袁石公持论甚好,真如神僧以嬉笑谩骂作佛事,此为上机者说,难为下劣者言也。”^[52]表现出对李贽、公安派思想的赞赏。而无论李贽还是公安派,都是在阳明学说及其精神的哺育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总的来说,浙南阳明学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浙南阳明学者或者与阳明门人同朝为官,或者与阳明门人同时同地讲学,这些人大都是通过与阳明弟子亲密交往的经历,接受或部分接受了阳明学说,参与或部分参与了王门的讲学活动,并把王门的学术旨趣带回了家乡。二是浙南阳明学者在接受阳明学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湛甘泉门人的影响,具有王湛合一的倾向。如洪垣(觉山)曾在嘉靖二十四年任温州知府,对温州的文化教育有一定影响,王叔杲即称洪垣为“我师”;许孚远(敬庵)因抗倭经历和学术地位而颇受到温州士人的推崇,纷纷“欲受业门下”,王叔杲即因“恨无缘一晤,以祛我鄙吝”;还有吕怀(沃洲)等人的学说,亦颇受温籍人士赞赏^[53]。三是浙南阳明学者大都具有实学文化的背景资源,所以在汲取阳明学的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把心学与实学相整合,或者用实学来解构心学,使心学实学化。这种倾向在浙南阳明学者复兴永嘉学的迫切愿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浙南阳明学者的努力方向并不是要回归宋学,也不是要简单的接引阳明学,而主要是想从本土文化资源出发,以争取心学与实学的并举。这种努力到了晚清,遂转变为经学与实学的并举,进而又使经学实学化。四是浙南阳明学者身上还有文学化的倾向。比如王叔杲之学以诗文为重,穆文熙称他为“浙东名家,问学渊源,而为人沉毅有识,绝无浮夸态,盖卓然当代文儒也。……士子熙然向学,文艺等于东南”^[54]。故而叔杲不仅与吴中文人关系甚笃,而且“尤笃意文学,每擒词藻染翰,力追作者。暇则延播绅学士谈说艺文,进郡邑俊髦阐析经术。……以故吴之士民尊而爱之,惟恐一日去已也”^[55]。如果说浙东阳明学者具有勤立宗旨的学术性格,浙西阳明学者具有谈说艺文的学术性格,那么以王叔杲为代表的浙南阳明学者所体现出来的便是浙东学者与浙西文人的双重品格。

注释:

[1]陈守文、何向荣:《刘基与叶适的比较研究——兼论“瓯”文化的两大主流内容》,《刘基与刘基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514 页。

[2]宋恕:《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325页。

[3]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4]陈荣捷:《朱子门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按:黄榦在谈及朱熹去世后各地朱门之境况时,浙江地区也只举了浙南的叶味道、潘时举和浙西的黄士毅三人:“向来从学之士,今凋零殆尽,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父、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时举,天台人)、黄子洪(士毅,自莆田徙居姑苏),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勉斋集》卷一四《复李贯之兵部》,元延祐二年刻本,第6页。)这大体上能够反映浙江朱学发展的大势。据此笔者认为,部分学者所谓“温州是缺乏道学传统的地区”(见陈安金、王宇:《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掘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的判断,值得商榷。

[5]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

[6]《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215页。

[7]如“含糊之病”、“科举时文之习”、“缴绕狭细之病”等(详见《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掘起研究》,第257~260页)。

[8]张宪文校注:《王叔皋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9]《东瓯金石志》卷九,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1982年,第11594页。

[10]方长山、魏得良校注:《项乔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11]王光美:《先参政公行状》,《王叔皋集》,第504页。

[12]宋恕:《书陈蜚庐〈治平通议〉》,《宋恕集》,第238页。

[13]《东瓯金石志》卷九,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1982年,第11594页。

[14]焦铉:《玉介园记》,《王叔皋集》,第452页。

[15]《王叔皋集》,第474、466页。

[16]拙作:《王学在新安地区的曲折与遭遇——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7]《宋恕集》,第454页。

[18]拙作:《闽中王学论考》,《福建论坛》2007年第1期。

[19]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7~1228页。按:据阳明佚文《范氏宗谱记》载,在潜赴闽地前,阳明曾潜投毗陵(今常州)三个月:“正德二年丁卯夏四月,守仁赴谪,逆瑾遣人随行侦探,予意叵测,晦形遁迹,潜投同志范君思哲之兄思贤于毗陵。君乃宋贤范文正公后裔,好学之士也。大江南北士大夫非其粉榆同社,则其孔李世交,不然则其遥遥华胄也。往来讲学者络绎,余心恐慌焉,君遂匿余于祖祠者三匝月。”(武进《范氏家乘》卷九,清范显瑶等纂修,同治九年志忠祠木活字本)此段史实,《阳明年谱》未记,应予补入。

[20]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〇《王守仁传》亦载:“附海舟游舟山,为飓风漂闽,有道士收之,故铁柱宫与语大悦者也。”按:“武夷自昔神仙居”(《王叔皋集》,第122页),为道教圣地,阳明路经武夷,并与曾在南昌铁柱宫相识的道士在此见面,都是其早年道教情结使然(拙著:《儒学正脉——王守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48页)。

[21]可能是正德二年阳明从海上进入闽界后,曾路过南冈,但并无太深印象,故而要求朱应周“异时来过稽山之麓,尚能为我一言其(指南冈)详”(《王阳明全集》,第909页)。

[22]《王阳明全集》,第908页。

[23]《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

[24]《王阳明全集》,第328、565页。

[25]拙著:《浙中王学研究》第二章第三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按:关于阳明学在台州的传播力度,还可举编纂《台学源流》的金贲亨为例说明之。金贲亨,字汝白,临海人,初冒高姓。正德甲戌进士题名碑之高贲亨,即其人也。官至江西提学副使。是书叙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陈选,凡三十八人,各为之《传》。其疑而莫考者又有十五人,各以时代类附姓名于《传》末。其《传》虽多采《晦菴文集》、《伊洛渊源录》诸书。然贲亨当明中叶,正心学盛行之时,故其说调停于朱、陆之间。谓朱子后来颇悔向来太涉支离,又谓朱子与象山先异后同云云,皆姚江晚年定论之说也(《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551页)。

[26]《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一》称范引年号半野,讲学于青田,从游者甚众。《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称范引年字兆期,“同复吾(夏淳)诸子师王子(阳明)……庚寅,与蒙泉子(孙应奎)董天真事。壬寅,以经师为有司延主青田教事,从游甚众。范子于讲艺中,时发师旨,诸生于青田县治纠村作字,为混元书院,祠曰仰止,肖王子像于中堂”。另据《阳明年谱》而知阳明曾为范引年建的混元书院写过《仰止祠碑记》(《王阳明全集》,第1335页)。阳明又于嘉靖二年撰《范氏宗谱记》,记中提到范引年。阳明歿后,范引年在天真书院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对薛侃十分推崇,认为薛侃“尚气节”,曾向叶权

讲了许多有关薛侃的逸闻逸事(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28~29页)。在范引年身上,使我们看到了归有光所谓“青田在万山中,足以读书谈道,优游自适。而浙东学者,近岁浸被阳明之教,为致良知之学。承式(狄承式)为人教朴敛约,不喜论说,而中有自得者”(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的说法,是不够全面的。

[27]项乔:《书文江集后》,《项乔集》,第116页。

[28]《文江集》的主编是阳明私淑弟子罗洪先。据项乔说:“《文江集》者,乔同年罗达夫集予师王子扬先生令文江时所作也。”(《项乔集》,第115页)

[29]王光美:《先参政公行状》,《王叔杲集》,第501~506页。

[30]李维桢:《重修温州府儒学记》,《王叔杲集》,第465页。

[31]王稚登:《福建参政旸谷王公墓表》,《王叔杲集》,第519页。

[32]王叔杲:《与耿楚侗先生》,《王叔杲集》,第256页。

[33]王叔杲:《毅所黄公诗集》,《王叔杲集》,第198页。

[34]王叔杲:《与胡庐山先生》,《王叔杲集》,第271页。

[35]《项乔集》,第25页。

[36]《项乔集》,第28、110、218、49页。

[37]《项乔集》,第25~28页。

[38]金峰戴:《龙门集后序》,侯一麟著、蔡克驷点校:《龙门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

[39]《项乔集》,第237页。《项乔集》卷四《杂著内篇》、卷三《与罗念庵论学》和《与欧阳南野论学》等著述,集中反映了他的阳明学观。

[40]项乔:《王遵岩文录序》,《项乔集》,第110页。

[41]项乔:《为崇重理学生员事》,《项乔集》,第669页。

[42]黄绾与张璁同朝为官,虽有政见上的分歧,但并不影响两人间的亲密合作关系(林希元:《与黄久庵兵侍书》,《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5集,第535~537页)。

[43]张宪文校注:《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522页。

[44]《王阳明全集》,第1428页。

[45]唐长孺:《跋明张璁书扇》,《学林漫录》——集,中华书局1985年;另见《张璁集》,第484页。

[46]《张璁集》,第283~284页。

[47]《张璁集》,第71页。

[48]拙文《王阳明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收录阳明与张璁书两通,内容皆为问候、奉承语,这恐怕也是钱德洪等人将其删除的重要原因。

[49]《张璁集》,第521页。明秀水朱国桢《涌幢小品》尝曰:“永嘉典嘉靖己丑试,会元唐荆川顺之,状元罗念庵洪先,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忤,最为得体。”

[50]郑思恭著、周于校注:《东昆仰止录》,《东嘉先哲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21~222页。

[51]《东昆仰止录》,《东嘉先哲录》,第261页。

[52]沈洪保点校:《何白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11、470页。

[53]《王叔杲集》,第288、253页。

[54]穆文熙:《赐宪使旸谷王公备兵三吴序》,《王叔杲集》,第436页。

[55]季德甫:《贺旸谷王公荣进藩参留镇东吴序》,《王叔杲集》,第446页。